

【哲学研究】

## “非西方”的社会学建构： 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

何祎金

(萨里大学社会学系, 英国 吉尔福德 GU2 7XH)

**【摘要】** 社会学是一门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学科,旨在解释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虽然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一直都是社会学阐释的重心,但是“非西方”仍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非西方首先作为历史参照,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形象,被欧洲社会学家用以反衬西方的现代和进步。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非西方的发展和崛起对西方社会学构成了直接挑战,西方社会学需要应对非西方崛起的问题,即对他者的现代性做出社会学阐释。

**【关键词】** 非西方; 社会学; 建构; 他者;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2)05-0125-07

现代性在当前的社会科学中,业已被塑造成一个存在自我指涉的“超级母体”(matrix)。它可以描述一切现代现象和现代特征,并可以解释为这些现象和特征的根源。社会学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计划,旨在对欧洲和西方发生的社会变革做出科学的阐释,即提供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在社会学的起源故事中,发生在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社会学起源的标准阐释。但是,古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中,不管是社会学学科术语的创立人孔德,还是其他奠基人如迪尔凯姆和韦伯。在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根据Wagner对现代性的考证,这一术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间才开始在社会科学使用,并且是在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开始使用现代性,而不是之

前采用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sup>[1]</sup>。相对于现代化理论对实现诸种现代制度的强调和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意识形态色彩,前者赋予非西方一个目的论的解释,容易造成核心与边缘、支配与依附之间的对立;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本身便是争论的焦点。因而,现代性术语的发明,为社会科学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它成为前缀或者后缀,应用到社会学对世界的阐释中。

欧洲是孕育这个“超级母体”的地理区域。吉登斯在解释何谓现代性的时候,将欧洲视为现代性发源和展开的主要场所。它是十七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现的社会生活或者组织的模式,最终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sup>[2]</sup>。在社会学的历史中,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存在制度阐释的模式。现代社会被定义为具有如下制度特征的社会:它的生产方式是工业生产,经济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

**【收稿日期】** 2012-02-06

**【作者简介】** 何祎金(1983—),男,湖南汝城人,萨里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非西方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Wittrock 指出现代性之下的社会具有两层意思：首先现代性是一个人类历史纪元；其次我们将特殊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定义为是符合现代性特征的<sup>[3]</sup>。虽然 Wittrock 并没有强调现代性的地理区域，但是在最初的关于现代性特征的定义中，现代性的欧洲经验使得欧洲成为现代性的主要载体。上述现代制度模式的定义，全部有其欧洲起源，并为欧洲想象非西方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在 Turner 对穆斯林社会的阐释中，遵循现代社会的制度阐释，穆斯林社会成为各种现代要素缺席的代表：中产阶级的缺席、城市的缺席、政治权利的缺席，最终甚至是自由革命的缺席<sup>[4]93</sup>。现代社会的制度解释模式对非西方社会而言，构成了直接的张力。对非西方而言，上述制度性特征，都是非西方所不具备的。现代化的概念，即用来表示某个地区或者社会对上述现代制度的全部或者部分的追求，以及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

事实上，社会学自古典阶段起，便对欧洲和西方之外的地区和社会进行阐释。对西方崛起的阐释，成为社会学古典阶段的重要命题。西方的崛起，需要一个非西方的他者，作为现代性的反证，提供西方优越性的合法化解释。此外，对非西方的阐释作为一种西方建构，为西方社会的自我认同提供了想象和参照。在 Said 对东方主义的论述和批判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完成了西方世界自我认同的定义<sup>[5]1</sup>。在社会学制造的现代性神话中，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变成了现代性和现代性的他者之间的关系。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非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民族独立的实现，摆脱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实现民族国家的建立；其次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崛起，在全球化背景中，发挥日益深远的影响力。古典社会学对西方优越性的描述开始遭遇挑战，社会学需要回答非西方崛起的问题。因而，古典阶段中现代性和现代性的他者的问题，作为西方和非西方的阐释基础，转变为西方现代性和非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本文认为，社会学对非西方的建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学在不同的历史情

境中，需要回答西方的崛起和非西方的崛起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的转换，意味着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内涵遭遇到了挑战。在理论上，非西方的他者形象，从最早的现代性的反证，转变为他者的现代性，社会学需要对这些西方的他者如何实现现代性做出阐释。欧洲和西方社会作为现代性的唯一标准被打破，现代性的一元论被多元现代性话语取代；在方法上，古典阶段韦伯式的强调社会自身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内部解释，过渡到了后韦伯式的研究。它们共同强调地方性的文化和文明，相对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形态，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起阻碍作用。后韦伯式的研究则强调这些地方文化和文明对现代制度的塑造所起的作用。

### 一、西方的崛起与现代性的反证： 进化论与二元论的双重叙事

社会学对西方崛起的阐释，依靠两种叙事来进行。其一是进化论的叙事，西方社会代表着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阶段；其二是二元论的叙事。在现代性术语出现之前，古典社会学采用一套二元叙述的模式来描述西方的社会状况。

在进化论的叙事中，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西方社会是在知识上进入了实证主义阶段的工业社会。社会进化论的代表斯宾塞则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摆脱了原始和尚武的军事社会，进入到文明的工业社会；在二元论的叙事中，迪尔凯姆区分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连结方式，前者是原始的和受集体主义束缚，后者属于现代的并且崇尚个体主义。滕尼斯对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或者称为共同体和社区的划分，重复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分类模式。在韦伯那里，对立的二元论表现为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和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展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在韦伯的以精神伦理和文化为重心的解释中，成为西方社会的独有模式。非西方在进化论和二元论的叙事中，要么处于相对初级和落

后的阶段,要么属于二元论的某一极,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自由、理性、文明的西方社会。因而,在西方崛起的叙事中,非西方被置于现代性的反证地位。

具体而言,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虽然共同面对西方崛起的命题,但是在对非西方的阐释上,采取了不同的解释策略:韦伯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继承和拓展了黑格尔的学术传统,西方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被解读为理性精神的历史,这种理性精神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所不具备的。黑格尔的阐释明显带有东方主义色彩。在韦伯的论述中,西方的独有理性精神被具体化为清教主义的新教伦理。西方社会的内部精神和文化心理,被韦伯阐释为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和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动因。在对中国宗教的论述中,韦伯在措辞上强调各种现代特征在中国的缺场。“资本主义关系的缺场”<sup>[6]84</sup>，“自然法和法律思想中形式逻辑的缺场”<sup>[6]147</sup>和“自然科学的缺场”<sup>[6]150</sup>。显然,韦伯的解释方法虽然强调地方性文化的内因,但是仍表现出“西方独有”与“非西方没有”的比较思维。中国的道教和儒教,成为西方清教主义的比较和参照物。当“西方独有”成为唯一的参照和标准的时候,东方主义思维的狭隘在所难免。韦伯的讨论,在东方引起了关于儒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因为在现代化议题上的重叠,单世联将他视为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讨论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sup>[7]</sup>。不在场的参与,虽然在字面上呈现出矛盾,但从一个侧面反应出韦伯对非西方解释的传播和影响之广。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在早期和晚期体现了学术旨趣上的分野。早期的迪尔凯姆追求理性和科学方法,提倡将社会中外在的限制性力量当作一种物来理解,并以此作为社会研究方法的准则;晚期的迪尔凯姆转而开始强调精神或者理念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如果说早期的迪尔凯姆,对理性的定位和追求体现了迪氏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那么晚期的迪尔凯姆,

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表现为另外一种思路。澳大利亚的土著,成为迪尔凯姆宗教社会学研究素材的来源地,用以提炼出迪尔凯姆的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理论。

非西方在这里的意义,虽然不被直接视为现代性的反证,但是作为研究对象和素材的来源地,却为西方社会学提供了前述的一种“可以进入的历史”。在现代和前现代的分野中,西方的前现代原型便存在于土著和非西方的传统社会中,对“他们”的认识成为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学家的的工作。其次,古典社会学的科学追求和一般化理论传统,尝试寻找一种普遍主义的解释模式,这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被诟病的地方。迪尔凯姆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分析,虽然限定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但是由此提炼出来的理论成果,由宗教基础造成的社会的可能却是脱离时空情境的,它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解释模式的欧洲知识。在迪尔凯姆的论述中,图腾、宗教和集体意识,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用以解释社会何以可能。

马克思的情形在社会学领域比较特殊,最初他仅被当作政治经济学家,后来才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和传播的后果。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提供了关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的解释,并在世界历史中被广泛实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命题,成为马克思对亚洲——在地理区域上属于东方主义论述对象的最大代表——的阐释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sup>①</sup>强调了非西方地区农业社会的生产特点,土地的集中化和私产概念的缺乏。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抑或经济决定论的阐释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成为阐释的重点。作为后果,停滞的、农业的、蒙昧的和专制的,成为描述和定位非西方的词汇。

进入社会学的现代阶段,社会学的重心由欧洲转入美国。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在美国被塑造成社会学的三大传统。这意味着古典

①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不仅表现了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指涉,同时也体现了知识和文化对地理区域和认同的建构。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尚不发达,农业占主导的俄国,在地理上甚至不被认为属于欧洲大陆。

社会学的欧洲遗产在二战之后，由美国社会学继承。帕森斯是社会学现代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其结构功能主义被认为是对欧洲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一次综合尝试，融合了迪尔凯姆、韦伯和帕雷托等人的社会学思想。古典社会学诸种旨趣和取向不同的社会学传统，被其整合为宏大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抽象的社会在帕森斯的阐释中被机能化为一个存在自发调节能力的社会系统，社会的变革和进化表现为社会系统内部分化和重新实现均衡的过程。帕森斯在七十年代曾赤裸裸地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sup>[8]</sup><sup>155</sup>。黑格尔的理性精神、韦伯更进一步的清教主义伦理，在帕森斯那里变身为非西方所不具备的普遍主义准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学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的中心，甚至连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的特点。帕森斯对韦伯的继承，不可避免地延续了韦伯理论所暗含的东方主义色彩。但是美国社会学对经验研究中量化方法的推广，在研究旨趣上的差异，使得美国社会学对非西方的建构，表现出和欧洲理论截然不同特点。相对于欧洲社会学对非西方的建构属于实质性的理论输出，文化和心理的内因、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主要论述对象；美国社会学的量化后果，使得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文明和宗教上的差异，转变为人口、GDP抑或各种发展指数之间的统计数据上的差异。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非西方地区的女性、教育、卫生健康等内容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所关注的新议题。

## 二、非西方的崛起与他者的现代性： 多元论与他者的重构

非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挑战了现代性的时空指涉，特别是现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关系中，对时间的区隔功能。双方在时间上

是平行的，但是却被阐释为各自在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化论和二元论的双重叙事，共享了现代性的这种时间逻辑。当非西方开始逐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国际事务中表达自主性的时候。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西方社会学需要回答这些过去的他者，如何实现现代性的问题。

一元论的现代性，把欧洲的现代性作为人类命运的唯一标准和模式，是首先需要清算的历史遗产。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的话语取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一元论解释，非西方地区被赋予了实现现代性的可能性，不仅实现路径，实现现代性的结果也是多样的。多元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制度阐释模式做出了调整，转而将现代性视为文化项目(cultural program)，强调地方性的文明和文化对现代制度的塑造作用。<sup>[9]</sup>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阐释模式对非西方形成的张力。类似的，Wittrock认为现代性分为文化和制度两个纬度，现代性表现为文化上的构成和制度上的确立两个部分<sup>[10]</sup>。虽然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了质疑，但是现代性本身仍被视为一项不可阻挡的全球事业。多元现代性对非西方实现现代性做出了后韦伯式的阐释。Therborn区分了世界范围实现现代性的四种路径：首先是通过自身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性的欧洲模式；其次是以欧洲模式为基础，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美国模式；再次是通过外力威胁和选择性输入而建立的现代性，比如泰国和伊朗；最后是通过征服与占领达到的现代性，以欧洲在南亚和北非建立的殖民地为代表<sup>[11]</sup><sup>124-139</sup>。

不管是多元现代性还是全球现代性，对文化和实现路径的阐释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打破一元论，代之以多元论的时候，社会学依然要对这种变化的合法性做出阐释。Eisenstadt的策略认为现代性在西方起源的时候，便存在诸多内部矛盾，比如理性和情感、自由和规训、控制和自主，它们为现代性提供了持续性的批判话语<sup>[9]</sup>。事实上，在现代性理论甚至是西方社会学本身遭遇合法性危机的时候，现代性被赋予自我修正的能力。

Arnason 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动态表明,它包含前所未有的自我定义、自我疑问和自我转化的能力。<sup>[12]</sup>因而,多元论对一元论的取代,本身就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一次自我修正。

正如现代性的他者仰视西方的时候,虽然西方存在众多独立且各具特点的民族国家,但是西方在概念上仍是作为一个完整实体而存在的;对非西方的想象同样如此,西方社会科学论述较多的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明和儒家文化仅仅是非西方的三种较大文明的代表而已。除此之外,在非洲和南美,还存在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因而,在面对非西方崛起,他者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学对非西方的重构,和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非西方在这里并不是被当作完整的实体,而是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上述 Therborn 对实现现代性路径的罗列一样,非西方的他者形象以不同民族国家为单位被重构。

欧洲现代性变为全球现代性和人类的共同命运,Therborn 提供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地区实现现代性的四种路径,这种类型化的解释模式同 Eisenstadt 对现代性历史轨迹的描述存在区别。Eisenstadt 将第一波全球化描述为现代性在二十世纪跨出西方,先进入亚洲,再触及中东,最后到达非洲的历史过程。<sup>[9]</sup>事实上,一元论的欧洲现代性虽然被多元话语取代,但是欧洲和西方自我认同的调整,与对非西方他者的重构在交替进行。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西方认同的地区,不仅因为新大陆上的移民多来自欧洲,还因为美国现代性对欧洲模式的复制;随后是苏联,在马克思的时代,俄国在地理上被认为不属于欧洲,它属于停滞和落后的东方世界。随着二战的终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建立起来的苏联由多个卫星国构成的共同体,成为继美国之后的超级大国。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另一种模式,欧洲对这个异质性的政体充满敌意。Arnason 将苏联模式称为另一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算是对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做出了回应<sup>[12]</sup>;继美国和苏联之后,日本也被认为是一个具有

欧洲特征的国家,从二战前的军事强国变为二战后的工业强国。西方对日本的认识,从东方主义传统中的蒙昧和落后,转为将日本视为和西方存在相似性,甚至将它作为西方现代性在远东的镜像,通过对日本的分析完成西方的自我审视(Western self-examination)<sup>[13]</sup>。美国、苏联和日本的例子表明,地理区域的划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是它背后却涉及文化与政治的认同和建构。

美国、苏联和日本是最先被完成重构的现代性的他者,一方面它们固然强化了欧洲对自身的认同和意识;另一方面,对这些地区的重构,仍然是在欧洲思维支配之下进行的。美国是模仿欧洲模式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苏联选择的是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竞争的另一种诞生自欧洲的理论 and 意识形态。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被认为具备了欧洲社会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科学对非西方他者的建构,欧洲现代性仍然成为标准。

### 三、西方与非西方： 主体间性与自我阐释

现代性是西方社会科学在起源和发展中的核心议题,围绕现代性的阐释,不仅实现了西方社会的自我理解,同时完成了之于非西方的他者建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指涉功能。在现代性话语中,古典社会学产生了多套二元对立的分类模式,一方面是对现代和前现代的划分,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方和非西方的划分。西方和非西方共处于相同的历史时刻,但是,没有发生现代性的非西方,仅仅被当作西方历史中的某个阶段而已。它存在的价值,不仅为西方的现代性提供反证,同时为西方理解自身提供了可以进入的历史(accessible history),与之区别的则是固化的历史(ossified history)。作为后果,它造成了时间上的区隔效应。现代性虽然被理解为一个人类纪元,但在最初却属于只针对西方而言的历史时刻。对非西方而言,它们尚处在西方已经走过了的历史阶段,因而为西方提供了一种现在

式的可以进入的历史。固化的历史则意味着已经逝去的，真正的古代。

但是，现代性造成的时间区隔正在逐渐瓦解。这意味着，面对现代性的他者，西方社会科学古典时期那种向后看的思维模式，即非西方的意义在于它为西方的优越性提供了可以进入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在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的调整中，非西方作为历史上现代性的他者，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他者的现代性。在双方共有现代特征的情况下，需要转变为平行对视的关系。因而这里引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这一来自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经由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拓展，成为消解主客二元矛盾的解药。在对韦伯的解读中，认为他将西方的基督教视为普遍标准，忽视了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行动主体的资格和论辩权利的宣称，亦即忽略了“主体间性”问题<sup>[14]</sup>。

本文认为主体间性虽然强调了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消解，将共同理解作为理论目标。表面上看，主体间性取代了在主客二分法中，争议颇多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性的准则，后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神话。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中，韦伯面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存在全面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历史事实。以历史唯物论的视角来看，韦伯并没有理由要为中国的现状辩护，认为那里也将或者即将诞生现代性文明。并且，韦伯的命题并不能用证实或者证伪的标准来看待。对社会理论的解读和阐释，不应该脱离具体的时空背景。正如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在历史上受到非西方的追捧而后却受到质疑和批判一样。首先它为非西方的落后提供了被认为是合理的解释，并为图存与自强创造了合法化的理由，而后却被认为是自然主义和东方主义思维的代表。韦伯和斯宾塞的例子表明，在面对新时空情境的时候，社会理论面临重构的必要。这种重构表明，对世界和社会的阐释，是一个持续而且充满张力的过程，并不存在固定和永恒的解释。

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非西方从一个现代性的不能者变为现代性的能者。表面上看，社会学古典时期的东方主义传统得到

了批判和修正。但是，非西方仍处于被西方社会科学持续建构的客体地位。乃至对非西方实现现代性的阐释，成为了西方社会科学对自身理论和学说修正的成果。主体间性的提出，旨在消解社会学长久以来形成的主客二元传统，但它同样属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一次自我修正。对非西方而言，它不改自己被观察和被阐释的客体角色，这是为什么在欧洲出现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容易陷入悖论之中，即成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强调共同理解和站在他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的主体间性，在非西方话语缺席的情况下，上述悖论并不能得到解决，非西方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再造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西方亟需完成从被阐释的他者到提供自我阐释的转变，不仅站在他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还需要更进一步为双方互为主体。

因而，非西方的自我阐释，绝非将自身置入进化论叙事的新阶段，抑或置入二元论叙事的另一极，阐释非西方对现代性的获得与特征。上述倾向也是非西方自我阐释，需要面临的困境。根植于欧洲经验的社会科学对非西方而言存在一种无法避免的他性，虽然不乏本土化立场、批判意识和自身主体性的强调，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仍需要避免对西方理论的重复和再生产，重视寻求自身理论资源的开发。

#### 四、小 结

现代性是社会学科学的核心概念，它被塑造成“超级母体”，提供现代特征、意义乃至起源的解释，并且对它的解构和重新阐释，使得现代性话语不断扩容。多元话语取代了将西方社会作为现代性唯一标准的一元论叙事，韦伯式的强调内部精神和文化的阐释方法过渡到了后韦伯式的研究。它们都强调地方性的文化和文明，将此作为实现或者阻碍现代性的内因，但是各自面对不同的结果。西方独有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在后韦伯式的研究中成为非西方独有的实现现代性的模式与路径。

现代性具有时空指涉的功能，表示一个前

所未有的人类纪元,在地理上描绘了西方和非西方的界限;它制造了时间区隔,非西方之于西方,变成可以进入的历史,对非西方的研究,成为对西方过去的认识。然而,这种时间区隔效应的逐渐瓦解,不仅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挑战,同时也为非西方的社会科学进行自我阐释提供了契机。

#### [参考文献]

- [1] Wagner, P. Modernity.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J]. *Thesis Eleven*, 2001, 66,(1) .
- [2]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Cambridge: Polity, 1990.
- [3] Wittrock, B. Modernity: One, none, or many? European origins and modernity as a global condition [M]. *Daedalus*, 2000, 129,(1) .
- [4] Turner, B. S. *Capitalism and class in the middle east :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84.
- [5] Said, E. W. *Orientalism*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 [6] Weber, M.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M].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1.
- [7] 单世联. 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 [J]. 开放时代, 2004, (1) .
- [8] Parsons, T.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96.
- [9] Eisenstadt, S. N. Multiple modernities [J]. *Daedalus*, 2000, 129,(1) .
- [10] Wittrock, B. Modernity: One, none, or many? European origins and modernity as a global condition [J]. *Daedalus*, 2000, 129,(1) .
- [11] Therborn, G. Routes through modernity [C] // In Featherstone, M., Lash, S, and Robertson, R. ( eds ).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12] Arnason, J. P. Communism and modernity [J]. *Daedalus*, 2000, 129,(1) .
- [13] Eisenstadt, S. N. *Japanese civil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14] 苏国勋. 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 [J]. 社会学研究, 2011,(4) .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铨]